

新思潮

第十一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每份伍角

RIVE GAUCHE 月刊

時事評論 文學 電影



必須起來爭取
中學生的民主權利

我們面對的危機

增收差餉是殖民地主義的行徑

政府女打字員爭取平等權利！

小鐘

十一月廿一日星期早上十時許，在中環政府合署停車場內，聚集了千多名受僱於政府各部門的女打字員，舉着「打字員薪酬最低，要求合理改善」的橫額，計劃遊行至港督府外，提出她們的要求。但由於受到警察的阻攔，祇得委派代表五十名，到港督府門外，提出一份書面要求。

是次行動是由港府華員會的打字員組所組織和號召的，參加者一千一百人左右。她們要求合理加薪，從目前的各級打字員薪酬七三〇元至一四〇〇元，增加至七七〇元至一六二五元。她們同時要求改善升職的機會。

原來早在今年二月初，華員會打字員組已經向政府提出要求增加打字員的薪酬。但是政府却一直拖延，不加答覆。直到八月十八日，政府發給司的一名代表，才與打字員組的代表進行正式會談；但這名代表不單答稱政府並不會考慮增加打字員的薪酬，且還計劃取消高級打字員和打字員兩種級制，使到目前的打字員永無升職和取得高級打字員（目前工資由一四〇五元至一六二五元）打字員現今要求增加由一七三〇元至二〇八〇元）薪酬的機會。

長期以來，政府對於打字員，不單祇給與政府文員中最低的薪酬，並且更由於打字員全部是女性的緣故，而加以特別的歧視。當一九七一年公務員進行全面薪級調整的時候，政府就已經藉口全部打字員都是女性，拒絕增加她們的工資，可是，到一九七二年港府又藉口男女同工同酬，實行全面取消女性公務員的班費和分晚期間的有薪假期，又將女性打字員在這方面的福利也一併取消。

除了放假七日，我們還要……

小陳

最近，港督突然大發慈悲，在立法局動議一條新勞工法例，除原有每年十日有薪假期外，強迫性地給與工人連續七天的有薪假期。唔，做嘢有錢兼有放假，我們無疑是舉手舉腳贊成。

消息甫一見報，議員大爺和各報的主筆大佬比我們這些真正受影響人反應更為熱烈和迅速。執報細看之下，發覺這班社會賢達的高見大約可分為兩類，一是表示歡迎港督新措施，其二是首先一句「原則上贊成此項措施，不過……」下面大有文章。

他們強調勞工法例訂立是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香港經濟發展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倚仗低廉勞動力，和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措施降至最低點，此之所謂「自由放任政策」，以此吸引外地和本地資本家投資的興趣，其次是香港局勢穩定。以他們的邏輯推演下去，工人任何改善待遇的要求，甚至港府對工人一些小小讓步，都足以減低投資者投資熱情，轉向外地發展，於是造成大量工人失業，由此一切社會問題依然而生，整個香港陷於混亂狀態。

如果以我們工人的尺度來看，這些「高見」一言以蔽之，完全是老板大人的意見。將經濟危機說是由於工人要求加薪，社會福利做得不好，工人力量（工會）勢力太龐大諸如此類的理論並不新鮮，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資本家自然以此作為降低工資，削減工人已得福利的藉口的基石。

如果說香港有甚麼特殊性，以我們看來，最大的特殊便是作為一寇寇的資本主義社會，勞工保障和福利比起其

期，又將女性打字員在這方面的福利也一併取消。如此證明出，港府有意將打字這種沒有創意的、刻板的，但却是辛苦的工作，維持成爲女性的「傳統工作」，沒有提供她們發展和升職的機會；在拒絕實行真實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之後，却又以同樣的藉口，削減婦女應有的社會福利。

銓敘司施格先生自己就坦承承認這一點。在十一月廿四日的立法局會議上，施格先生聲稱：「已婚的女性公務員並不能享有若干種同級公務員的福利。」（廿五號「文匯報」）。雖則施格先生的發言與女性打字員的問題沒有正面的關係，但港府的政策却是一貫的。

所以，港府對其屬下打字員的歧視，並不單是由於她們是打字員的緣故，而且也是由於她們是女性的緣故（不然她們也不會被迫於受僱於如此刻苦而無味的婦女「傳統工作」）；她們所受到的歧視是雙重的歧視。

在這個社會裏面，到處都是婦女受到特別歧視的現象。不過，女性打字員十一月廿一號在政府合署和港督府抗議的行動，却證明了婦女是有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的，和其他公務員（例如：政府丈量員、物料管理員前些日子的加薪鬥爭）、教師、護士等一樣，男性和女性，都能够依靠自己團結起來的力量去爭取合理的權利，而婦女之受到特別的歧視，就更需要這樣做了。

婦女團結是巨流！ SISTERHOOD IS POWERFUL!

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不如。廠主隨時可關廠走人，棄工人於不顧，沒有訂定最低薪資，可隨老板「需要」任意調整，失業後政府又沒有救濟金設施。工人利益不但沒有法律保障，甚至連逗留廠內與不負責任的老板談判的權利，港府反制訂了甚麼「冷靜期」法案，予以禁制。

香港工業總會作了一項調查，據說在接受調查的一千四百八十三名工人中，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反對必須連續放假七天，和禁止十六至十七歲的工人逾時工作，從這項調查可以顯示些甚麼呢？就是香港工人工資菲薄，不足夠在這生活程度日增飛漲的社會裏生活下去。工人不是反對放假，贊成逾時工作，不是有暇唔識享，而是如果填不飽肚皮又怎能輕鬆舒暢的享受閒暇的日子呢？所以，我們與其消極地反對連續七天放假，毋寧積極地向港府爭取更多的權利。立即訂訂最低工資，成立保障就業及救濟失業等法例，取消冷靜期法案。

我們的眼睛是雪亮的，從我們切身體驗中可以看到這些會是一派胡言。香港由七三年開始的經濟衰退，是受全球性經濟危機所影響，而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工人，有三十至四十萬工人失業，包括工人家屬更有超過百萬人受影響，加上隨之而來的物價飛漲，港府落井下石的加價成風，更使全港消費者，尤其是貧苦大眾喘不過氣來。現在，我們一方面聽到那些經濟學家大量報喜文章，說甚麼香港漸趨穩定，工廠訂單紛至，美國、日本等地的經濟亦趨復甦。另一方面我們的工資雖比前略略有增加（例如電子行業），但以目前的生活程度相比，加了等於沒有

爲台灣人權呼籲

一羣關心台灣的留學生

編者按：以下的一封呼籲書，分別刊載於各雜誌，由一群署名「關心台灣的留學生」由美國寄來，文中所述的「黃案」，雖未經台灣當局公佈無從得知真偽，但，本刊鑑於案中人物牽連甚廣，人命關天，事涉及基本人權問題，故加以刊閱。並要求台灣當局立即釋放一切被捕的政治犯。台灣當局鎮壓言論自由，侵犯人權等行徑，已爲世界正義人士指斥，同類案件的揭發讀者可參考本期國際欄論「台灣政治犯被迫害」一文。

今年七、八月間，正當海外報刊報導「台灣政論」副總編輯張金策和黃華被捕下獄的消息時，台灣又發生了一樁規模更大、手段更狠毒，而且同留學生有關的政治迫害事件。可是，一般人都被蒙在鼓裏。

這樁政治迫害事件的打擊對象是台灣省籍立法委員黃順興。台灣的人們都知道，黃順興在台灣立法院是一門打得很響的大砲。他跟康寧祥、黃信介等人一樣，都是靠勇於批評黨政國民黨而贏取選民擁戴。尤其難得的，他是由知識水平較低的彰化縣選出，足見他的影響已經深入鄉間的民衆。爲此，國民黨恨他好利害。他在立法院的言論，台灣的報紙自然是不發表的。但我們從他自己印行的「國會與我」等專集看來，他對國民黨的弊政，尤其是壓榨農民的各種殘酷政策和措施，都有極其深刻的了解。他以冷靜而銳利的言詞、講道理的態度，指陳了這些弊政，而且

加。根據本年三月發表的數字顯示，現在實際價值的工資尚未能追上九七一年九月的數目呢！而資本家在經濟不景中又受到甚麼損害呢？善於精打細算的老板，自然會將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發展的惡果交給工人嘗，根據政府收到的利得稅顯示，甚至在七一年度至去年度最壞的幾年裏，實際盈利仍然有增無減。勞資關係，唇齒相依，鬼話！

聽說他在知識青年中間也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國民黨對黃順興一直加以嚴密監視。今年夏天，國民黨終於抓住他女兒的小辮子，對黃順興開刀。

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二十五歲，於一九七五年赴日本留學。今年夏天回台灣探親時，國民黨警備總部即把她扣押起來。根據最近訪美的台灣政界人士透露：國民黨指控她的罪名是在日本時曾與反蔣人士接觸。黃妮娜的被捕日期是今年七月一日。過了幾天，黃家的友人相繼被捕，只因他們與黃順興的密切來往。

此後，黃順興的朋友們陸續「神秘失蹤」，據說已被抓了不下二十人。這些人三更半夜被國民黨帶走時，家裏妻啼子號，而他們一去就毫無音訊，也不知關在哪裏。其中有些人的家屬，生活正陷入絕境，兒女被迫中途輟學，而國民黨的特務還恫嚇他們說：不得向外界透露抓人的事，否則連家人都有麻煩。

據台灣某政界人士私下透露：國民黨有意對黃妮娜「從輕發落」，但（對）黃家的朋友們則要「從嚴處置」。按國民黨黨法處的慣用語，「從輕發落」通常是指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常見的是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判處十年，以第七條判處七年或四年有期徒刑或三年感化。「從嚴處置」是指以該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判處死刑，財產全部沒收。

這就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揪住黃妮娜的小辮子來整黃順興的陰謀。當然，現階段，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抓黃順興，只要抓他勢力圈中的要角。這就如同國民黨不抓「台灣政論」社長康寧祥，而抓兩位副總編輯一樣。黃順興在台東縣、彰化縣和台北市都有他的群眾基礎，各地朋友也很多，如果國民黨抓他，會引起各地民衆的反感，這是小蔣所忌諱的事。

黃順興和他的朋友們也都是受地方父老所愛戴尊敬的人士，難道他們做了什麼傷天害理、大逆不道的壞事嗎？如果有，爲什麼國民黨不敢公佈他們的「罪行」？難道是因爲人數太多，登出來有失國民黨的面子？還是因爲國民黨反正不把台灣老百姓當人，要抓就抓，要殺就殺，理由反正是「不可告人」的？

由於國民黨對這一案件的秘密處置，我們不難推想，一定還有很多人被抓而報紙上不公開的案件。偶而公佈，可以給人一個「公開審判」和「近來很少抓人」的錯覺。這正是小蔣比他父親高明及狠毒的地方。

台灣國民黨當權者應該立刻公開黃案的案情，把被押人、被押地點通知他們的家屬。國民黨應該公開審判黃案和判決政治犯的野蠻法西斯作風必須停止。海外人士應該一致起來抗議和揭發國民黨濫捕、濫判所謂「政治犯」、「思想犯」的恐怖統治。國民基本人權必須都得到無條件的保障。請人人都來把這件告訴朋友、同學、同鄉、美國朋友，主持公道，主持正義！（附揚金海被迫害的證據一文。）

國民黨這種忽視國民基本人權、自由的殘酷作風，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生活

一份支持爲保障生活待遇而鬥爭的刊物。

歡迎索閱，請寄來回郵票

出版者：生活編輯委員會
地址：九龍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電話：三一六五八八五七
出版日期：逢每月一號出版（免費）



增收差餉是殖民地主義的行徑

何虹

十一月二十二日，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范禮宣佈明年政府所得的差餉總額將高達九十多億元，即比今年增加四十多億元，因為差餉的徵收率佔租值百分之十八，重估的租值將比四年前的估計平均增加百分之八十。消息甫一傳出，社會各界人士嘩然，紛紛表示反對增收差餉。隨後，差餉物業估價署又放出消息說重估租值雖然增加，但徵收率可能在明年三月經立法局調整，差餉增加的實際數目還未確定，可能會少於百分之八十五云。

不過，無論是估計租值增加，還是徵收率增加，無疑港英政府怎樣玩弄數字遊戲；如果現時以提高租值估計不能得到期望的增加，政府明年還能以提高徵收率增加差餉收入。增加是必然的，懸而未決的是增加多少的問題而矣。大有可能政府放出聲氣來試探市民的反抗程度，以決定它能掠奪多少。

一項對廣大住戶的打擊

范禮在宣佈要增加差餉的同時，更提醒業主們：「差餉基本是向樓宇估價人徵收的費用。亦即是暗示了這次港英政府增加差餉的打擊對象是廣大買樓自居的市民，而非少數依靠收租發達的大業主。只要業主在租約上規定要租客負擔差餉，他們便不會因此而有何損失。對住戶而言，這實則是變相加租。」

一九七四年的業主、租客，綜合修訂案曾被政府吹捧為管制加租，保護住戶的法例，但它却是把兩年加租百分之二十一合法化，明文規定住戶要負擔不斷增加的租值是合理的。現時港英政府又宣傳差餉是應由住戶負擔，這無疑是港英政府以另一名目直接地向住戶加租，而無須通過業主，把民脂民膏納入自己的口袋裏。

差餉的增加亦將影響及全港百多萬居住於公共屋邨的勞苦大眾。港英政府以各政府部門以自供自給的名義，除

我們的看法

最近，校園內發生了多宗學校當局無理侵犯學生人身自主權的事件，例如某天主教女校，主任修女強行剪學生頭髮，某校老師強強掀起女生裙腳檢查有否穿底裙，搜查學生書包等等。諸如此類的橫蠻行徑已不是今日才發生的了，但，一直以來同學們均逆來順受，最近這幾年來，同學們的反應是熱烈和積極，或群起上教育司署抗議，或投稿報刊尋求公理支持，這顯示出同學們已覺醒到在頭上不合理之壓迫必須起來反抗。

事實上，學校對學生民主權利的剝奪不僅於此，其他如學生選讀文科的權利，在校內閱讀課外書刊的權利，甚至一些私生活，以至組織學生會和出版學生報等等的權利，校方都插上一手，橫加干涉。

更荒謬，這些不合理的措施，却被制定為條文校規，強迫學生遵守。政府對此採取縱容態度，最明顯，當學生往教育司署投訴時，當局只是空泛地口頭加以安撫，對肇事教育司不加以制裁，但不用說去觸動那些不合理的規條了。

在我們看來，學校那種極端粗暴的家長式約制，是紀不能獨立來看，應從更廣泛的平面去理解。學校的不合理措施，學校當局和個別教師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但最主要

了迫使公共屋邨居民負擔樓宇的修葺和清潔費用外，還有房屋司署興建新屋邨的建築費用，還有差餉等。房屋署署長廖本懷已在范禮宣佈增加差餉後，聲言下次加租時將一併調整增加了的差餉金額。即是下次的加租率將超過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一。

「估估吓」的官僚作風

差餉物業估價署已在十二月初開始把租值估價通知書發給各區的業主們。根據各報章上揭露的租值估價額，驟增得最厲害的是租金低廉的戰前樓宇，其中有些現時的估價比上次估價高出八九倍。因而造成差餉的數目還高於租金，其他新樓和戰後樓宇的估價比上次的估價高出一倍左右。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副署長許文盛說租值估價是「根據假想樓宇今天重新在市場上出租時可得到的合理租值來評估，而不是根據該樓宇的業主實際收取的租金……來評估。」換言之港英政府是以其心目中的所謂市面合理租值而無須按照市民的意見而訂出估價租值的數目。

由於戰前的舊樓受到過去訂下的租務條例管制，租金一向低於新樓數倍，但現時經過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重估後，港英政府就能越過租務管制條例驟然增加舊樓住客的負擔。港英政府厚著面皮說「戰前舊樓重估後，其應課差餉租值增加幾倍是不出奇，甚至將來還可能出現差餉還多過交租的情況」，因為如果「戰前樓宇的業主重新出租其樓宇，與租客私訂租約而不受租務條例限制時，租金往往可以增加數倍，所以，我們重估戰前舊樓應課差餉租值時，是以重新出租的租金作參考。」（許文盛說）

但當一位小業主問及一位外籍估價官：「如果我居住的单位無法依照貴署所估租值出租，港府是否會給與補償？」那位洋大人則回答道：「此話說不通，交差餉與租值沒有關係。」（明報十二月四日）

這種被范禮稱為是「藝術而不是科學」的租值重估，就是港英政府要全面地，迅速地越過業主增加差餉住戶的負擔的捷徑，這些洋大人就是把勞苦大眾的血汗當為掌中玩物。

在十二月三日，當通知書只發到西環和上環的業主手中，業主們已分別領去二千多份反對重估的租值數目的表格，可見所謂租值估價的「離譜」程度。由於業主們紛紛索取反對表格，導致差餉物業估價署要增加人手，職員的工作負擔突為加重，可見這種專斷的估價更做成了政府行政無必要地複雜化，以至浪費公帑，和加強政府文員的勞動強度。

隨着差餉的增加，就是在一些沒有規定要租客繳付差餉的地方，業主也會以增加租金把差餉轉嫁到租客身上，業主也會懂得以港英政府所訂的，高昂的，所謂合理租值出租樓宇，或估計售價。因此隨之而來的正是年前使勞苦大眾最受打擊的，港英政府的三高政策的延續。

不合理的差餉制度

顧名思義差餉是所謂差人的糧餉，原來是用來支付警務、水費、街燈等開支，是港英政府要在香港統治中國人，但又本地居民負擔被統治的費用的殖民地主義產物。正如范禮所說「差餉本是向樓宇估價人徵收的費用。」而不是一項針對物業所有人徵收的費用。即是英帝國主義幹着霸佔中國人的土地，但還要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中國人向它繳付費用的無本生意。因此差餉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的稅收，而應被取消。

十二月三日，港英政府更建議提高戰前舊樓的標準租值——住宅樓宇平均增加二十八元，商業樓宇則平均增加七十八元。這就更顯現了。

現時，差餉收入已成了港英政府全年收入中的一项，擬入整個財政計劃中。在政府各項重要稅收中，營利率的徵收率只是百分之十七點五，比差餉的徵收率百分之十八還要低出百分之零點五，廣大勞苦大眾只是由於他們居於原來應屬於他們的中國土地上，就是抽出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一部份收入，獻與港英；但各大真正資產雄厚的地產商、

點睛篇

美國的總統競選使香港（甚至全世界）的新聞界熱鬧一番。在一般人心目中美國大選是民主制的最高表現。今期紹元的「美國大選的意義」一文徵引不少活生生的例子，將美式民主假面具揭破，並由此展示了這個「黃金國」存在的社會危機和解決危機的出路。

怨曲，在樂迷心目中是爵士樂其中一派，但在黑人歌者粗、艱澀的吶喊中，却包含着早期黑奴的辛酸淚，和現代城市下階層人的怨聲。Phillip君的「怨曲」和現代城市下階層人的怨聲。Phillip君的「怨曲」和現代城市下階層人的怨聲。Phillip君的「怨曲」和現代城市下階層人的怨聲。

今期「南非中學生反種族壓迫」一文，以一位南非青年學生領袖的現身說法，揭破為白人統治者服務的南非中學教育制度，並報導南非中學生、聯結工人動員起來的反抗少數人統治者的運動。對於飽受殖民地奴化教育催殘的香港青年而言，是一個極佳的借鏡。



「四人幫」的垮台以來，有關四人幫過去醜行劣跡，正不斷的暴露出來，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國領導層希望藉對四人幫的批判和暴露他們過去的官僚手段，藉以洗脫中國官僚層的官僚面孔，把過去的一切官僚行徑推至四人幫人身上，並藉此掩蓋華集團的官僚阻礙，今期紀堂君的「攪陰謀詭計與中共的官僚政制」一文，搜羅了大量的材料和印證，說明華江集團同樣是官僚貨色。

政府宣佈增加差餉租值百分之八十後，不但全港有樓人們大小業主群起反對，即使一般市民也因害怕掀起另一波「加」風而極表關注，今期我們刊登了何虹君的「增加差餉是殖民地主義的行徑」一文，作者一針見血地闡析，不但政府今次不徵詢民意，片面加價是政府不民主的做法，而且「差餉」本身是代表了殖民地統治的標記。由於加差餉或大小地影響香港每一個市民，我們希望各讀者能踴躍投稿，發表意見。

新思潮座談會

題目：校政與中學生權利

時間：十二月廿六日（星期日）

地址：九龍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下午二時

電話：3-658857



美國

大選

的意義

紹元

每一年的美國總統競選都其他各國的大選受到香港的報章——以至全世界新聞界——的緊密報導。很容易使人覺得，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對於我們是有不同影響。固然，從智利至南韓四處支撐着反動政權，金融資本從非洲到東南亞遍佈全球的強大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內部政治局勢對世界局勢是有緊密的關係。但控制新聞媒介的大財團大事報導美國大選的理由却不止於此。長久以來，美國都被譽為「自由世界」的中心，國內的總統競選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模式，是人民真正平等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模範——一人一票，每人都有平等權利決定誰應代表人民推行國家政策；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揭開「民主選舉」的黑幕

在關於美國大選新聞報導中，我們聽到或看到的只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參與角逐。有時候，共和黨被形容比較「保守」，而民主黨則比較「自由」，這樣，美國就被描劃為沒有剝削與被剝削階級，壓迫與被壓迫民族。但事實上，這兩個大政黨都是被大財團的金錢和勢力所控制，兩個政黨的領袖無例外地是資本家，如洛克菲勒之在共和黨，而卡達這位大地主之在民主黨。所謂「保守」和「自由」的形容亦是虛偽的，歧視黑人而臭名遠播的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正是民主黨人。

由於美國資本主義在過去的擴張繁榮，使美國資本家們能為勞苦大眾提供一些有限度的讓步，如增加工資，普及教育，設立失業援助金，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從而使一般人寄望這批大資本家控制的政客集團解決社會問題。美國的大資本家們製造出這兩個屬於他們，被他們控制的政黨，當一個政黨的總統的政策為人民不滿時，又可以換上另一個，使之穿梭交替，來疏導民衆對政府的不滿。美國的大資本家們為了保護它們在美國政壇的壟斷，甚至利用國家法例，自覺地排斥其他黨派在選舉中向這兩個政黨的候選人挑戰。

美國有一位電視新聞評論員曾說：「駱駝穿針孔，富人上天堂，比第三黨加大選選容易。」

美國各州的競選法例規定任何一個黨派如在上次競選中，得不到百分之五或以上的票數，就必須在各州內收集相當數量的已登記的選民的簽名支持，才能成爲候選人。全國所需簽名的數目高達六十萬，這是排斥少數意見在大選中反映出來的不民主做法。各州的總數竟高達六十萬。

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得到大資本家的支持，他們可以花費巨款在電視台、電台、報章上賣廣告，散發大量傳單，僱用職業人員進行助選活動。自從水門事件，大資本家們在大選中的賄賂，陰謀手段爲世共知後，一九七四年，美國國會便開始整理出一批所謂競選運動改良法案，美其

是一些政治行動委員會進行助選活動。雖然委員會的經費最高限額是十萬元，但法例並沒有規定委員會的數目。看！大資本家要壟斷大選是多麼容易。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競選運動改良法案的另一詭計便是總統競選的公共資助，這些公共資助的受益者，當然又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在初選時，任何一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參選人最高可得五百萬美元的資助。如果這些政黨中途退出，他們還能繼續花費納稅人的金錢。初選後，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正式候選人還可得二千萬元。在這次競選中，福特和卡達共花去了七千萬美元，而其中五千一百萬就是美國的稅款。其他黨派則要在過去的競選中得到百分之五或以上的票數，才有資格得到少許的資助。美國的大資本家們利用這兩個政黨向來在大選中所取得的勝利，而形容這些黨是多數人的黨，巧妙地使兩黨壟斷合法化，否定其他政黨應有的平等權利。但這兩個政黨却長久以來都是少數的，今年的選民投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三點三，而卡達得到其中一半多一點的票數，即是說卡達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美國人民的支持。

今年大選前，福特和卡達的大辯論被大事宣傳爲美國式民主的另一典範。但從種種跡象顯示，這次大辯論却是虛偽的，是在事前經過精心佈置。一位在場的紐約時報記者報導：「當他（指福特）提筆時不是真正在做筆記，而是爲了攝影機而假裝出來的。」（註一）這次大辯論還不是爲了攝影機而假裝出來的。雖然聯邦法規定，在大選期間，各候選人應有相等的上電視時間，但這次電視台轉播了福特和卡達的大辯論，卻沒有給與其他候選人相等的時間，通過電視媒介發表他們的意見。電視台的行爲却完全爲美國司法部和國會所認可，可見相等的時間只是對共和黨和民主黨候選人適用。

除了這些合法的把戲外，美國的大資本家們還有其他非法把戲來保護他們的壟斷權利。自從水門事件的披露後，越來越多的證據證實美國聯邦調查局人員是不斷非法地監視和破壞左派團體，迫害激進人士，聯邦法例規定候選人要提交任何會給與十元以上捐款的人的身份，這對於參與競選的左派團體來說就是有可能使他們的支持者被聯邦調查局人員迫害。在大選期間，美國聯邦調查局還派了六十六人在其中一個參選黨派——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進行破壞活動。這樣的做法又怎樣有民主可言呢？

選民的冷漠

美國大資本家們向來都爲人民在投票時，對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支持而感到驕傲，但今年他們的傲氣要收斂一點了。今年大選中的一個特點是民衆——特別是工人，青年和被壓迫民族——對大選的冷漠。今年初選只有百分之十七點六的選民投票。卡達只是得到百分之四點二的選票。大選的投票率則是百分之五十三點三，是自一九四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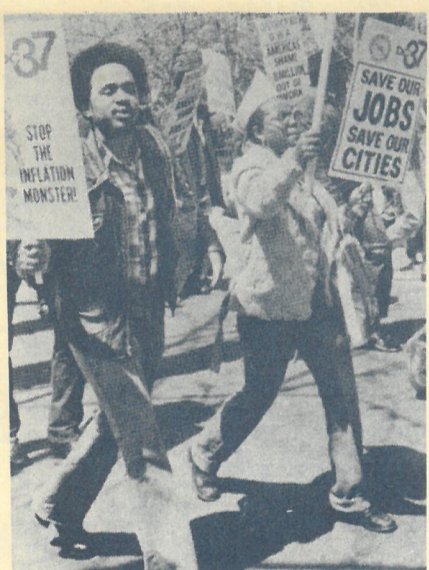
在國內和國外的約定所束縛，但要緊的是令白宮和國會的政務得到美國人民的尊重和愛護。」（註二）說得好！競選的目的不是令美國人民有機會參與決定國家內外政策，而是做一幕活劇使美國人民支持資本家的政策。今年選民的冷漠却反映了美國人民對資產階級政府信心的削弱。有一次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只有百分之二被訪問的人表示對政客們大有信心（註三）。當美國民衆對這些資本階級失去信心，便會開始找尋合理的、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這正是資本家們的恐懼。

大選結束後，發現有過半數的選民投票，資本家們就已歡天喜地。在十一月五日，美國最大規模的銀行之一——華銀行（CHEMICAL BANK）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整版廣告，宣稱：

「美國：七千九百萬
冷漢：零」

超過七千九百萬美國人證明選民冷漠的估計是無根據的。人民有話要說而他們說出來了。我們感到他們還證明另一件事情：這個制度是可行的。」

但，其餘沒有投票的六千七百萬美國人，以華美銀行的推論，却恰恰證明了，這個制度是越來越不行。水門事件，美帝國主義在越南、智利幹的醜行，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國內破壞民主權利的勾當等事情的披露，更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懷疑美國資產階級政府，從而認識到它的真面目。這都造成了選民的冷漠，同時又增加了尋求更好的轉變的情緒。



爲什麼卡達會獲勝？

在競選期間，美國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選比一九六五

面對着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福特和卡達究竟提供了什麼解決辦法呢？

在福特任內，對於社會福利保障的削減是不遺餘力，而卡達呢？他曾說：「我要肯定美國人民不會爲不能提供的承諾所誤引。」這些「不能提供的承諾」這就是：「立即給與國家和地方政府財政需要的答案，立即提供國民健康保險，立即提供福利計劃的聯邦化。」（註四）

對於解決工人就業問題，福特和卡達也沒有提供具體的解決辦法。福特要削減聯邦政府設立更多工作崗位的費用已是臭名揚遠。而卡達則有時候會抽家地說「他會使美國人回到工作崗位去」，但有時又強調「百分之三的人失業率是相當於整個經濟中的百分之四至四點五的失業率，而這是一個合理的目標。」（註五）

對於被壓迫民族反對學校隔離的鬥爭，卡達以「倫理的純粹性」，而福特則以「保持倫理的遺產」來維護種族主義者。卡達所屬的教堂還是一所排斥黑人參加的白人教堂（註六）。

對於正嚴肅打擊婦女生活的公共托兒所的關閉，與及國會對婦女墮胎權利的限制，他們都沒有表示反對。

對於軍事開支方面，他們都支持美國繼續保持龐大的軍費以準備侵略其他國家，雖然卡達說他會略加削減。在競選時說，他主張美軍逐步完全撤出南韓，但這個無實現的承諾也於獲選後數日被背棄了（註七）。

哥倫比亞新聞部的民意測驗顯示每年入息超過二萬美元的投票選民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支持福特，每年入息低於八千美元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六十二支持卡達（註八）。這正好證實了福特在大辯論結束時的一段話：「我認爲在這次競選運動中，真正的問題是：你是爲他（指卡達）的承諾投票，還是爲我兩年來在白宮的政績投票。」美國的勞苦大眾是憎厭福特的所謂政績，寧可寄望於卡達的「承諾」。在卡達的承諾中最有作用的是卡達對就業問題的承諾，全國廣播企業新聞部的民意測驗顯示支持卡達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爲了就業理由。

美國工人運動的領袖更幫了卡達一個大忙，在大選前夕，某些工會的通訊甚至成了卡達競選的宣傳品，美國勞工聯盟——工業組織會議的麥芝根州通訊，在投票前的一期是以「保障你的工作，投卡達一票！」作頭條。根據全國廣播企業的統計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工會成員投票支持卡達。

明顯地，卡達的勝利是建築於工人階級對現存資本主義政制的幻想，企圖從卡達身上能夠獲取更大的生活保障，和民主權利，但，現時美國社會的問題，正是美國龐大的財富是控制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資本家們爲了保持他們的利潤，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勞苦大眾的生活，同時鎮壓人民進行反抗的民主權利，所以，卡達與其所代表的大資本家是無能解決現存社會危機和普遍勞苦大眾的合理要求。

解決美國當前的危機，只有把財富從少數人手中轉到大多數人的手上，消滅資產階級把財富作爲自己利益服務和剝削工人的工具，消滅一切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這樣把政權轉移到多數人的手裏，建立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工人政府，把一切有關社會和國家的決策由多數人參與和民主地制定。實行計劃經濟，將美國這個巨大的財富，進行有計劃的分配，把過去龐大軍事的投資和對世界各地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持費用及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進行顛覆所浪費的財富，投入生產建設，而更迅速地提高生產，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支援世界各地的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幫助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平等；在全球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註一：紐約時報九月二十五日。

註二：紐約時報五月二十八日。

註三：紐約時報六月二日。

外，利用人民的稅款來支持共和黨和民主黨大選的壟斷。

聯邦法例規定，總統候選人初選前只能接受某一人或企業的五千美元捐助，初選後可再接受五千美元。但現時，大資本家們可以有另一種在競選中投資的方法——或

(從六月中旬開始，南非索維托區的黑人中學生，首次發動抗議南非白人少數政府強迫在教學上使用「南非荷蘭語」(AFRIKANS)的學生抗議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的黑人城鎮，並且亦迅速地從圍繞着語文問題的學生鬥爭，發展到反對整個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工人同情和支持學生的反抗，在八月和九月，百分之六十以上黑人工人，響應了學生的號召，進行了兩次為期三天的罷工。

南非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學生和工人的反抗，却以槍殺、暴力、拘捕、入獄等等回報。根據英國一份雜誌的報導，已經有三百人以上被殺，二千人以上被捕。

下面受訪問的，是南非索維托區「學生代表會議」的主席馬舒里尼(TSITSI MASHINI)，他也是六月中旬索維托區學生抗議運動的中心領袖。本文是在十月六日在倫敦接受的訪問節譯。原文刊於十一月十五日「國際通訊」。



南非中學生



反種族主義壓迫 小可譯

最懂得反映美國資產階級意見的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曾說：「福特和朗奴列根，卡特和堪富利，盧達爾，材爾殊和布朗之間是否真有不同呢？他們全部都會被過去

，由幼稚園低班至大學預科，索維托並沒有大學，如要繼續升學，便要入其中一間部落大學。

問：你可否描寫一下南非黑人中學的情況和教育制度。

答：每個學生除了自備所有入學的必需品外，你還要付出高昂的學費。雖然有一些津貼，但通常只是給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

一班裡有八十多名學生，就算在中學裡，亦是二、三人共用一張書枱。小學裏，學生就坐在一行行的木枱上，連桌子也沒有。我所讀的學校沒有暖爐設備，空落落的就只有課室和黑板。文具和粉筆由「班圖」教育部負責供應，課室內的其他一切設備便由學生提供。

四月以後，「班圖」教育法下令，如果沒有錢交學費便要搬出校門。每天不穿整齊校服上學也要被搬出學校。不論任何過錯都會被老師體罰，每一間學校都有它自己的校規。在我所讀的學校，如果你沒有結好鞋帶、領帶或

年為低。過去兩年來，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大量社會福利開支的削減更深刻地打擊了美國勞苦大眾的生活。現時，失業工人的數量高達七百五十萬，青年人的失業率則是百分之二十，而黑人青年的失業率則更高達百分之四十。雖然資本家大事渲染所謂經濟復甦，但是過去一年內總失業率還是徘徊於百分之八左右。

讀到的東西，在南非是被禁制或者只是供給白人看。由此你們可以想像到我們對於外界所知甚少，除了基辛格去蘇黎世時他們報導了。地方報紙集中於刊載地方新聞，中學生對讀報不會長期感興趣，因為那是白人的報紙。

每一個南非中學生——以中學生為基礎的「南非學生組織」是今次爆炸的噴口——雖然不能清楚地告訴你贊斯基爾(TRANSKEI)是壓迫的另一面，但他們却理解像南非荷蘭語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壓迫。即是說，我們所受的教育，只是簡單地培養我們在踏進社會的時候，如何成為白人最佳的工具。

問：南非政府最近提出所有課程都要用南非荷蘭語教授，這是一部份而已？

答：每個中學生要學習七個科目：兩種官方語文、英文、南非荷蘭語和土語，以及四個其他科目。南非荷蘭語政策強迫其中兩個科目用英語教授，兩個科目則要用南非荷蘭語。

是沒有扣鈕便會被罰，如果女同學沒有扣好外衣鈕也會被處罰。

在南非，師生之間是很隔膜，只有很少例子，老師會對其學生關心，通常老師只是進入課室，指定功課，然後便走出課室，如此而已。

問：所有老師都是黑人？

答：是的，所有都是黑人。我的學校有一位白人老師，他今年才來，並未受到學生歡迎。據我所知，在南非差不多有八十位白人中學教師，這大概是向外界表示南非的黑白人很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吧！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由於黑人學生所受的痛苦，這些白人教師被學生毆打。

問：你能否描述最近圍繞着「南非荷蘭語」問題而發生的學生抗議行動？

答：我們在南非並沒有接受很多的政治教育，你們這裡能

以我們現在的教育方法和缺乏物質條件以供研究之用，學生是難以理解生物學、物理學和地理學上的觀念的。但現在更好像要使用一種不大精確的語言去做每一件事，而老師也從沒有學習如何使用南非荷蘭語去教授學生——南非荷蘭語在社會上流通面很細，因為除了一些官方刊物同時使用兩種語文外，每一處都是用英文，接受英文授課差不多十一年之久後，這是很難適應的。

不少的初中學生罷課，隨後又復課，其中富提學校是特別的，罷課足足有六個星期，直到取銷了以南非荷蘭語教授才罷休。任何一件發生在學校的事，新聞界都作為一次反對南非荷蘭語的抗議行動。

我們感到反感和厭惡，因為一項壓迫不單沒有漸漸離開我們，這個制度，事實上又鼓勵另一些來壓迫我們的思想。我知道人們對這些事會感到厭煩，但沒有一個人開始作任何實際的東西。我決定如果我們舉行一次示威應該會產生反應，因為在索維托從沒有過示威。在我們出世之前

註三：聯邦郵報六月二日。
註四：州際通訊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註五：華盛頓郵報四月十二日。
註六：戰士報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註七：明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八：州際通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或是我們還是嬰兒的時候曾經有過沙佩維爾示威，對這些我們所知甚少，因為任何關於沙佩維爾示威的資料和文章都被禁制。

我們聽說在偉和特倫倫大學的學生舉行了示威，所以我想這也許是我們開始着手的途徑。我是「南非學生運動」在我的主席，在六月十六日之前的一個星期三，我召集了所有的同學，向他們作了一次關於南非局勢的演說，希望振奮他們的情緒能夠作出一些事。

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我把示威的要點簡略的告訴同學們。在星期六我們在學校的欄柵上貼了一張標語：「注意，保安部隊不得進入，違者有冒被刺皮之險」。新聞界現在將這作為反對南非荷蘭語的一次抗議行動。星期日，「南非學生運動」在索維托有一個學生會議，在這會上我和其他學校的同學取得了協定，決定動員所有高中及初中同學。

經過了星期一和星期二兩天的籌備，星期三我們走上街頭示威，整個過程都是和平的，只是有標語斥責強迫使用南非荷蘭語是另一種壓迫的方法。

我和一些同學寫了一份備忘錄，表示所有索維托的中學生都拒絕以南非荷蘭語作為教學語文，除非這規則除去，我們不再復課。當警察開始向學生放槍時，我仍嘗試去告知同學們停下來，以便我們能夠公開向他們演說。

問：有多少學生參加六月十六日的示威呢？

答：報上說有一萬人，我不清楚確實數字，但我可以看到有萬多人。我想差不多所有索維托中、北、東、和南部的中學生都有參加了，只除了除了南部沒有。

問：在學生示威之後，索維托的工人怎樣組織起來？

答：在六月十六日之後，我們感覺到被殺的數目太多，所以我們嘗試找一個方法，既可以打擊這個制度又可減低傷亡，我們沒有武器，沒有槍械，唯一的武器就是癱瘓完全在黑人工人手中的國家經濟，所以方法就是停止工人工作。

我們向父母——他們都是工人——發表聲明，要求他們在某日至某日不要回廠工作。從那時開始，工人也參與我們，他們與學生團結一致留在家中。我們分派小冊子，然後流傳出去，這樣工人就組織起來。他們一直以來都希望參與鬥爭，但缺乏具體的組織能夠號召罷工，這只能夠通過學生去做。

問：由於六月十六日事件政府的鎮壓，你想南非政府能不能粉碎黑人運動？

答：我想他們將會禁止黑人組織「黑人醒覺運動」的活動，但一個新的爭取解放陣線將會出現，它會迫使人民進行地下工作。政府只能看到各種地下工作的活動，但不知道這究竟是誰做的。

這個制度現已樹立了許多敵人，許多人都同情「黑人醒覺運動」。但由於害怕被捕，所以不願參與任何政治行動。在六月十六日之後，政府每晚都搜查差不多五十戶人家，許多人被捕，甚至被殺。迫使許多人準備做任何事來對抗這個制度：就是這個制度使許多人妻離子散。

事實上，我要說這個制度本身比任何一個黑人組織更能提高黑人的醒覺。它是自掘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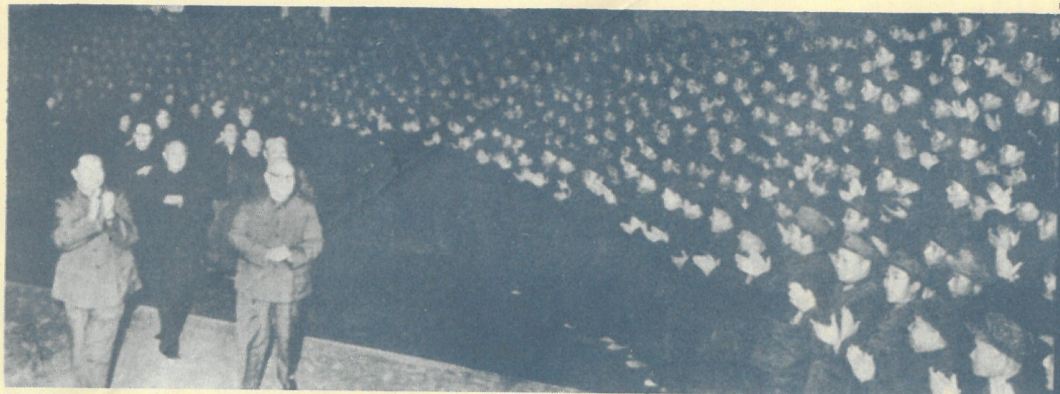
問：你可否描述一下索維托的生活狀況？

答：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清楚地描繪一幅索維托的圖。索維托是南非最大的黑人城鎮，大約有八萬幢房子，住了超過一百萬人。

我來自一個有十二個小孩的家庭，加上父母，一家十四口住在一幢有四間八乘十尺房間的屋子裡。很少房子有電力供應，就像貧民窟一樣，有電力的房屋大多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煤氣亦少，很多基本需要居民都不能負擔，因為工資十分低廉。事實上，在一九七四年的一次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的索維托居民，薪金僅足以維生，根本談不上還可能有其他的人類需求。

除了你的傢私外就一無所有，房子不是屬於你的，它是屬於「班圖」行政局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必須有工作是上學，否則便會被遣返原居地。

索維托只有很少娛樂設備，只有兩間戲院和六間市政禮堂，還有一些分散各處的遊樂場。學校差不多有三百所



官僚政制

搞陰謀 與 中共的 計詭

紀堂

毛澤東逝世不足一個月，正所謂屍骨未寒，他生前一手培植的宮廷派，並以「坐直升機」形式安排他們佔據中共領導層各個要津的「四人幫」，現在又被稱為「四害」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與姚文元等，終於在職業軍人及官僚聯手之下，以「閃電」方式通過把他們「粉蠶」，頓時從「國家領導人」的寶座由「直升機」跌落十八層地獄，變成待罪的「禁囚」了。中共政治人物這種暴升暴跌的特性，除了反映出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愈來愈猖獗，因而形成其黨內的高級幹部以爲一旦找到了領導權力就可以爲所欲爲，「整天吃喝玩樂，大肆揮霍人民財產。」（引十月二十一日北京百萬人大會上，工人代表陳福漢的發言。）同時還深刻地揭示出，甚麼馬列主義原則，甚麼毛澤東思想，完全不是這些領導人物的行動指南，反而成爲他們清算異己者時扣人帽子的材料。直至目前爲止，中共官方仍然沒有把這次重大事件向人民作出具體的交代，仍然因噤其詞，只以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清算林彪集團那句「三要三不要」的話搪塞了事。

據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在首都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稱：「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不聽毛主席的話，肆意篡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攪修正主義」。同日的「二報一刊」社論更指責：「他們進行分裂黨的罪惡活動，抱成一團，另攪一套，在黨內自成體系，爲所欲爲，稱王稱霸，把自己凌駕於毛主席、黨中央之上。他們大搞陰謀詭計，到處插手，煽風點火，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他們顛倒是非，製造謠言，大造反革命輿論，捏造罪名，亂扣帽子，企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崇洋媚外，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十月二十五日的光明日報）

中共政治局另一個委員，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章國清在廣州慶祝大會上公開指責這四個幫說：「他們反對周恩來總理，反對毛主席親自提議的對華國鋒同志的任命，反對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光明日報）

因此，中共這個新當權派就下結論說：「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就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伙資產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二報一刊的社論）

各個省委及部隊頭頭亦紛紛表白他們的打落水狗的精神，通電中央大力擁護對「四人幫」的整肅行動。江蘇、浙江、江西等地的省委亦乘機落井下石，指責「四人幫」背着毛主席、黨中央，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干擾、破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給他們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難。」山西省更揭露：「今年一月，正當我們貫徹毛主席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的時候，他們派人來到山西攪串聯、作報告、煽風點火……今年七月，當我們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學習推廣大同鐵路分局經驗，解決鐵路運輸問題的時候，他們又利用手

中的權力，進行封鎖，阻撓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干擾破壞山西的大好形勢。尤其令人憤憤的是，在全國農業學大會議以來，他們竟大搞陰謀詭計，妄圖砍倒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紅旗……



廣西壯族自治區委、革委會及廣西軍區揭露「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中攪打砸搶的導演」。福建省委「強烈要求把「四人幫」永遠開除出黨，並給以最嚴厲的制裁。」上海已經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上述消息均摘引新晚報十月三十日的報導）

光明日報更把張春橋在四十年前以狄克筆名撰寫一篇批評魯迅門徒蕭軍（田軍）的「八月鄉村」的陳年老帳翻出來，從而證明他老早就是一個投降派。

北京新華印刷「裝釘車間工人理論組更撰文揭露江青，「她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說的是冠冕堂皇的話，幹的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動不動就訓人、罵人；她口口聲聲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却大搞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她口口聲聲說要當工人的「小學生」，却盡力吹噓自己，罵工人「屁也不懂」。

其實「四人幫」上述種種的劣蹟敗行，惹得天怒人怨，完全是毛澤東生前一手縱容的結果，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爲要抓回失去的部份權力，他指使這個「四人幫」以左的面貌出現，鼓吹要實施巴黎公社的原則，胡說要砸爛官僚主義制度，空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揚言要觸犯修正主

義大官們的利益。因此，在最初的階段裏，這些偉大的空言確實吸引了廣大的革命青年投身紅衛兵造反運動，將劉少奇一派所把持的黨政機關砸個稀巴爛。但當這些青年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準備徹底打倒官僚政制，實施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時候，毛澤東又忍火自焚，急忙與林彪軍事集團勾結，利用後者的力量大力鎮壓紅衛兵的革命組織。據「黃河」雜誌第二期揭露，軍隊亂槍掃射紅衛兵總部，僅「廣州三屠」已經有數十萬人下獄，許多人就在被捕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而廣西省當局挑撥兩派紅衛兵組織自相殘殺，更是血流成河了。

把成千上萬的青年驅入上山下鄉，又是毛澤東指使「四人幫」所攪的傑作之一。其後他與林彪集團的矛盾，迫使後者死無葬身之地。

在反鄧小平的鬥爭中，毛澤東同樣以拉一派打一派的陰謀詭計，粗暴地剝奪鄧小平支持者的申言辯白的機會，教唆「四人幫」胡亂扣人政治帽子，不惜自毀國法黨章。

總而言之，「四人幫」的禍國殃民的行徑，只不過是執行毛澤東生前極力維護之斯大林主義個人獨裁式的官僚政制而已。華國鋒集團在毛澤東生前對「四人幫」惡蹟罪行不敢稍露微詞，反而與他們沆瀣一氣，對工農兵群眾擺出一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架勢。今天由於中國政治氣候轉變了，秦始皇式的統治正在受到廣大群眾唾棄的時候，華國鋒集團打着爲民除害的樣子，把中共官僚政制所種下的種種罪行，狠狠地推在「四人幫」的身上，同時還剝奪他們的辯護權利，這種顯然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不是攪陰謀詭計又是甚麼呢？

華國鋒集團口口聲聲指責「四人幫」篡改毛澤東指示，說他會於四月三十日給華國鋒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的字條。但據流傳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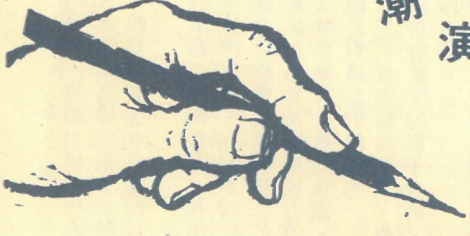
的「毛澤東最後遺囑」透露，毛澤東在六月三十日上午召見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陳永貴等人表示：「你們今後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決不能倒，要提醒她避免犯從前的錯誤……」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說話，誰真誰僞，只有黃泉下的毛氏本人才可分辨了。無論如何，把國家政權的領導人職務私相授受，取決於一個領袖的遺言指示，漠視廣大工農群眾及中共黨員的意向，這決不是一個自稱無產階級政權應有的準則，這完全是反動的封建皇朝的傳位翻版，這種做法不單沒有絲毫的馬列主義味道，也是造成攪陰謀詭計，攪政變暗殺的根源。

即使從中共十大所通過的黨章而論，華國鋒這次三料黃袍加身亦是非法的。中共黨主席、軍委主席及政府總理的任命必須經由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而政府總理的任命還需交由人民代表大會核准。這些法定手續雖然在毛澤東生前已經被踐踏得支離破碎，已經徒具空文，爲甚麼打着挽救國家前途，爲民除害的華國鋒集團不是一樣地漠視中共中央委員們的基本權利嗎？同「四人幫」當權時隨便任用私人，隨處結黨營私難道不是一丘之貉？

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門群眾暴動雖然給中共官僚當局壓平了，但是中國工農以獨立的力量來干預國家政治事務的趨勢，給與中共的官僚統治一記當頭棒喝，而「四人幫」在此事件力主鎮壓的叫囂，再加上他們在文革期間橫行霸道，胡亂鬥人，不關心工農生活的種種有乖常理的行徑，事實上已經喪失人心，成爲過街老鼠，逢人叫打了。毛澤東一死，「四人幫」護符頓失，華國鋒集團遂利用人神共憤的情勢，把工農兵群眾與中共官僚政制日漸增長的矛盾轉嫁到「四人幫」身上。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固然可以轉移群眾的憎恨對象，同時亦伺機繼續維護那早已腐臭的、秦始皇式的個人獨裁統治制度。

十月三十日

新思潮演講會



題目：回顧一九七六年的中國
 時間：一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地點：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電話：3-658857

中國革命與婦女解放

●陳瑩
●赤旗

第五章婦女與教育

婦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是走向解放的重大進步。在舊社會，婦女雖然不能用以證明其他方面亦存有男女平等，但却可以看作婦女在中國革命中自身地位改善的一項指標。事實上，中共至今為止，在教育方面，的確提供給婦女的解放最大的貢獻。

解放前的中國，教育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解放後，中共發起了「一項群眾的識字運動，成績斐然，對婦女的解放要求，有極大的助力。例如，在天津和太連，在九一五個不識字工人婦女中，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五參加識字班。在一九五八年，超過一千六百萬的婦女通過了識字測驗。」（註一）

根據帕蒂·陶海說：「大規模的成人教育是在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到一九六六年時，在為成人舉辦的日校中，估計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是婦女，同時在夜校中，女生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五。」（註二）

在小學程度上，並無性別歧視。婦女就讀小學人數從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廿五，增加至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卅；技術中學則從百分之十八增至百分之廿二。但九年內才增加了百分之五至十一，並不算是特別的。

隨着年級學歷越高，婦女就讀的人數就越少。據「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於一九七一年訪問中國時，知道北京大學裏，只有百分之卅的婦女是黨員和共青團員。在一九七四年，江蘇省農學院六百五十一名學生中，只有二百八十個女生（註三）。

由於中國婦女到今天仍然被認為要負起傳統的家庭角色，她們中大部分都被排除出高等教育之門。宋慶齡解釋稱：「在某些農村中男權觀念仍然有它們的影響。比例上，男孩比女孩更多上學。有些甚至乎感到女子終歸要到另一個家庭，因此就不應出錢給她們上學。」（註四）

連達·哥頓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訪問中國紅山公社生產大隊後說：「我們訪問一間強迫教育的小學，它有一半的女學生；而不是強迫的初級中學却有百分之廿的女生。當我們詢問因由時，生產大隊革委會主席說在這一區內男孩比女孩的出生率高……我們在一次有很多其它生產隊員出席的正式討論中再問他，他照樣回答。那時我們代表團的女團長就坦白說我們並不信。在傳譯員翻譯了這些話後，有一段長久的靜默。最後，坐在室中後排的一名婦女說，她認為太少女孩在初級中學的原因是女孩是被認為要做家務。」（註五）

只要「家務」一天仍由婦女而不是由國家承擔起來，婦女就不可能獲得真正平等的教育權利。

第六章結論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我們已解釋過，在舊社會，婦女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放。於是，問題提出：社會主義是否真正為婦女尋求得到解放？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有何關係？雖然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曾為婦女尋求到解放，馬克思主義是否引導到婦女解放的道路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傳統。

每一個人自然都會假設，每一個支持革命社會主義的人都會支持婦女的權利，就像支持其它受壓迫的社會階層的權利一樣。這正是所有偉大的社會主義領袖——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茨基、蔡特金和羅莎·盧森堡——的想法。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解釋，假如沒有社會主義，婦女不可能獲得自由；但如果沒有婦女解放，社會主義的成功也是不可思議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面，首先對婦女受壓迫的根據和其將來的終結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解釋，說明了家庭制度、階級社會和私有財產制度所衍生出來對婦女的壓迫。

繼共產黨宣言之後，恩格斯寫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深刻地解釋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和婦女解放的道路。

列寧，他提出要建立一個革命黨，將支持婦女的要求放進黨的綱領裏去：「我們的要求，是從資產階級社會中，對毫無權利保障的婦女所實行的可恥欺壓中，從她們的迫切需要中得來的實踐結論。我們從而指出，我們認識到這種需要，並且明白到對婦女的壓迫，以及男性的特權。從而，我們痛恨，是的，我們痛恨這一切，並且要消滅一切那些奴役和壓迫女工、主婦、農婦、小商人妻子，並且在很多时候是有產階級婦女的一切東西。」

馬克思主義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並不單在思想領域內。歷史上將社會主義聯結到婦女解放的最重大事變就是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二月革命是由紡織女工的示威引爆

的。十月革命將馬克思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綱領，從思想領域推到實踐中去。它證明了工人階級的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它同時證明出，只有推翻以私有財產和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制度，才能為解放婦女所需要的社會變革打開大門。在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完全支持婦女解放的目標。革命打碎了沙皇政制的封建傳統基礎，婦女取得了與男性一樣合法而平等的權利，墮胎和離婚的權利。對於工人婦女、孕婦和母親，國家都給與特殊的照顧。

一九一九年，蘇聯共產黨所通過的黨綱明文指出「要最終地消滅所有以前不利於婦女的平等和偏見的痕跡」。它說：「黨並不將自己限於形式上的平等，它並致力於以公社房屋、公共食堂、洗衣中心、托兒所等等，來代替過時的家务，將婦女從此等物質枷鎖中解放出來。」

當時蘇聯的婦女解放，當然並未達成，那只不過是開始而已。但已為全世界婦女的解放，提供出一條應走的道路。

中共

斯大林領導下蘇維埃政權的墮落，取消了社會各方面進步的措施，婦女的地位亦受到連串的打擊。家庭制度再次受到頌揚。墮胎變成非法。離婚越來越變得困難。娼妓和同性戀再次被認為是犯罪。托兒所被關閉，或者縮短開辦時間。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鞏固，以至取得政權，都是一直在斯大林主義的薰陶之下，承襲了它的傳統。第三次革命之後，在中共自覺的推動下，迅速地控制了全國社會，一個具有自身特殊物質和權力利益的官僚階級迅速發展成爲一個社會階層，並且日益企圖鞏固其特權地位。

宋慶齡，中國婦聯會領袖，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官僚階級的一份子——坦白地說：「假如我們問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否已走到它的終點，答案就肯定地不會。事實上土地制度已經被消滅了差不多廿年，但大部份封建殘餘意識却仍然在農民中十分普遍。這種意識仍然在農村和小縣鎮中做不成不幸的事。只有當封建殘餘的意識被根除掉，我們才能希望男女平等能夠完全實現。」（註一）

但是，這個將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看成是「封建意識的根除」的同一個宋慶齡，却過着一種與封建貴族類似的生活。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梳利士巴利（HARRISON S. ALISBUCK）報導：一九七二年他被邀請赴宋慶齡的一個晚宴，「她住在北海（IMPERIAL LAKE）湖畔一間曾被滿清皇子住過的宮殿裏」。晚宴的多項菜色包括白鵝湯、中國蝦、魚和鴨。她為了僕人的愚鈍而道歉，並且解釋道：「我們必須自己服侍自己了，我的勤務員全部去了農村訓練學校接受政治的再改造。而新的勤務員還沒有訓練好。」（註二）

能够在中國過着宋慶齡這種生活方式的中國官僚階級，其實才是中國婦女解放的真正障礙。他們吮吸着特殊的物質利益，而拒絕將它們用作來爲婦女的解放提供基礎。

我們的主張

我們堅決地不同意中共當前的領導，將婦女的權利從屬於官僚階級的利益和政策。我們認為，女性主義的獨立要求，不單與社會主義建設沒有衝突，並且應該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責任，爲婦女的解放，建立起必須的社會架構，因此，我們提出：

蘇維埃政權的墮落，根源於俄國生產力的落後和貧乏；連年的內戰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孤立政策增加了這種落後所成成的困難。一個官僚階級遂在貧困的環境下形成和鞏固起來。

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裏面，托洛茨基用了整整一章去解釋斯大林主義的反應，如何對婦女和家庭制度產生影響；並且解釋建立在物質貧困基礎上的蘇維埃政權，是不可能建立起足夠的社會設施，將婦女從家庭制度的重擔下解脫出來。斯大林特權官僚階級的鞏固，是必須維持着家庭的體制，和繼續着對婦女的壓迫的。

但是這場反動並不會走到其盡頭。資本主義並未有在蘇聯復辟。革命所帶給婦女的若干成果，尤其是教育和就業的機會，仍然保留着。

但對於婦女權利的壓制——以及對一般權利的壓制——都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來進行的。這使到全世界的反動力量，都藉此來誣蔑社會主義。事實上斯大林主義正是馬克思主義最不可調協的敵人，它對婦女解放運動的立場，與馬克思主義底傳統毫無共通之點。

當前，婦女運動之在全世界平面上新的興起，將會推使保衛馬克思主義對婦女解放的立場，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所謂「封建殘餘意識」，只不過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藉口，用來掩飾中共拒絕真正致力於保障婦女的特殊權利，以及女性主義的要求而已。

中共對婦女解放的態度底實質，揭露於一九七五年六月號的英文版的「中國重建」。北京市婦女組織副主席——一個長期的中共婦女領袖——著文宣傳道：「在革命政權建立後，對於如何爭取婦女的福利，常常存在着兩種意見。其一認爲婦女組織亦集中於直接與婦女有關的問題上。在一九四七年農村解放區裏，土地改革正在破壞封建的土地制度。一些同志們認爲農民協會應該負擔土地改革，而婦女協會應只做婦女福利的工作。」

「另外一個看法認爲，婦女協會當然處理與婦女直接有關的問題——否則它就會脫離群眾。但更重要的任務，而且也是革命的任務，就是去推翻壓迫一切勞動人民的封建地主階級。假如地主不被推翻，婦女就會繼續被剝削和壓迫。而且，就算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亦不是人人得到保障，婦女的福利就只能是一個學院的問題。大量的討論幫助我們看到第二個觀點是正確的。」（註三）

這種在中共認爲是「正確的」立場，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無絲毫共通之點。它暗示了婦女解放運動不單不能幫助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它們之間甚至乎還存在衝突。在這種衝突之中，婦女就應該放棄她們的權利（福利），在一個「爲了社會主義整體利益」的名義下，迫使婦女放棄提出真正符合她們利益的獨立要求，實則從屬於官僚階級的利益。

給予婦女合法而真實的政治和社會的平等權利。解除任何對婦女參加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居住和旅行，包括建立一個獨立、不受國家所控制的婦女組織權利的限制。

下接第九版

我們面對的危機

曼德爾訪問記

巴慧譯

曼德爾 (ERNEST MANDEL)，一九二三年生於比利時，在布魯塞爾大學和巴黎大學受教育，於一九四〇年參加比利時左派反對納粹；差不多同時，他成爲里昂·托洛次基(同年被墨西哥被斯大林的密探所殺)和第四國際的支持者。他曾被納粹蓋世太保拘捕三次，逃脫了兩次，第三次終被囚禁於不同幾個的集中營裏，直至戰爭結束。戰後他爲比利時一份週刊「左派」工作，並在一九五六年成爲它的編輯。亦在比利時(工人總聯會)的經濟研究小組內擔當了七年工作。

在一九六八年法國五月事變時，曼德爾扮演過顯著的角色；自此以後，他就被法國、美國、瑞士和西德禁止入境，原因「並不是由於帶有槍械、或者拋擲炸彈，而是由於要保衛我的思想」。超過了六個歐洲的國會議員抗議將曼德爾拒斥於兩個共同市場國家境外。

他現在是布魯塞爾大學經濟學講師，却還是托派第四國際的一名領導人。在他論形成當前經濟危機底動力的巨著——垂死的資本主義——面世後，劍橋大學經濟學系授給他下一次的馬歇爾學位 (ALFRED MARSHALL FELLOW)。在一九七七年，假如到時不被英國拒絕入境的話，他就會取得這個經濟學最高榮譽的地位。

× × × ×



●你對當前的世界危機有甚麼看法？

●這是一個從幾個層面爆發出來的危機。它明顯地是一個經濟危機。在西歐工業國家內有一千七百萬失業，意味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所共知的長期迅速經濟生長和上升的期望已經完結。這是一場社會危機——所有社會關係的危機。而它也是一場政治危機，因爲在這些新環境之下，以議會——所謂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政府——來政治地組織政務的整個時期已走到終點了。

我們也可以說，新企業——特別是汽車、塑膠、化工、電子——的巨大擴展亦已終結。過去在科技上會有很多意味着巨大利潤的進步、很多新發明和發現，現在仍然有很多，但它們越是來越化費龐大、越來越冒險了。看看和諧式超音速飛機就可知道了。沒有任何私人企業敢冒這種風險，而它們變得越來越不能接受。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更一般性地說，所有推向長期以來的擴張的動力，已經將自己消盡。

同時，多年以來賴工人階級的力量，會阻止了老闆們將通貨膨脹的重擔加到工人身上。物價上升，工資隨之而上升。工人們並不容許工資上升少於物價。在這個意義上，存在着利潤的危機；結果減少了投資額，做成更多的失業。無需隱瞞地，我可以說當前的經濟危機，是整個世界的老闆們以龐大的失業額來削弱工人階級的企圖，從而使他們能基本上將通貨膨脹的重擔放到工人身上——將他們的工資壓低。

在英國、德國和美國，他們這個政策取得初步的成功——日本較少成功，在南歐國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由於工人們有力地強烈地反擊，却絕沒有一點成果，一些諸如比利時及瑞典的小國，成效是有一點點的。這意即我們正處於一個困難的時刻：資本主義的困難時刻和工人的困難時刻。那些愉快的日子，那些「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日子、那些充滿希望的時刻，都已過去了。所以，假如我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它意味着我們將有更劇烈的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

這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它可以有好的結果，可以有壞的結果——依賴於力量的對比上、依賴於領導。我想，在一些南歐國家，有好結果的機會很強。工人們會保衛自己，演變成進攻、會動搖現存的社會、會嘗試以改變這個社會的組織來解決這個危機底問題，會採取一次決裂以走向社會主義。假如這個不會發生，就會做成危險，那時工人運動經過多年努力之後，可能會失去它的衝勁，而進攻就會從右派、甚至會從極右派來發動。

很多在繁榮時期能被老闆所容忍的條件，在危機時就不能爲他們接受。在西歐很多傳統地是議會制的國家裏，現在有一些壓迫性的肯定性威脅，針對着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運轉工會和工人階級組織的自由。這些醜惡的威脅會嚴重地擴大——就算在英國，你也不能肯定地會得到那個所謂議會傳統所保衛。假如這次老闆的進攻成功的話，一些過去會在殖民地裏(現正發生於愛爾蘭)的醜惡事情，就會再被用於英國本土，針對着英國的工人和英國的勞工運動。

●你是否認爲左派的分立和相對地弱小是危險的呢？或者會是基本上有正面意義呢？

●首先我會說，在西歐的主要國家內，革命左派仍然是弱小的，但比過去是較強了——大概比十年前大十倍吧。我們強烈地不同意，走向社會主義——在西歐的一次革命的發展——的跳躍會基本上依賴細小却極左傾的小團體的主動性。我並不相信你能够在西歐般的工業國家內以一小撮人來做成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而我所關心的並不革命團體的優點還是弱點，而是那些才是群眾準備採取的客觀上革命的——讓我們說——反資本主義的主

動性。每一個人談及法國賓沙崗的納彌(LIP)工廠工人反對老闆關廠的決定而長期佔據工廠。他們佔領了工廠，並且開始出售他們自己生產的手錶。事實上在過去十五一六個月內，在歐洲有兩百個像納彌廠的局勢。

幾萬名工人(如果不是歐洲幾千萬工人的話)所做的，就是未來事變的標誌。而且，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的總罷工牽引了一千萬人。我想，在未來數月內，一兩年內，我們可以目觀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意大利會有比一九六八年五月更大的總罷工——更激進的要求，特別是更先進的自我組織形式——工廠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委員會等等。這是我目前所看到在西歐發展的革命形式底可能性。

●你能够就年青人——特別在英國——受反理性主義思想——玄術、星相術、神秘主義等等——所吸引，作出些甚麼結論呢？

●我認爲它具有頗爲不祥的重要性。在六十年代後半裏，至六八年爲止，你會見到巨大的樂觀主義浪潮、感到年青人——青年學生、青年工人——能够改變世界，並能够迅速地改變它。這是十分積極的，但却具有巨大的幻想因素。積極，因爲它顯示出那個長期以爲繁榮會扼殺年青人的政治興趣的固有觀念是錯誤的。我們看到在柏林、巴黎、倫敦、羅馬、米蘭和其它歐洲城市裏，千萬計的人爲支持越南革命而示威。我們看到了西歐青年政治的覺醒、政治熱情的真正重生。

但是，學生和青年本身，却缺少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力量足以靠自己來改變世界。對這個問題缺乏瞭解做成巨大的失望。而自從七十年代初期起，青年人裏面就對政治活動有了某些退却，隨着的是越來越大的挫頓感。年青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改變事物，而當它們自己改變時，就好像法國人所說般，他們却越保留原狀。在英國及其它一些歐洲國家底政治形勢又加強了這種挫頓感。例如：現在工黨政府所做的，與希斯政府在類似形勢下所做的，並沒有多大分別。人們會感到在政治生活裏無另一條出路——他們並不會、或者不能夠看到細小的極左小團體可以作爲當前可信賴的出路。因此他們失去了希望，感他們不能改變世界。

而這就是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個人或集體逃避主義的培養地。因爲，社會並不太美好、生活亦並不太美好。不單只空氣和食水受污染，社會也受污染。假如你不能尋求到一個集體和革命的改變，那麼你至少想尋得一個個人的逃避，而這這就是這種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所在。

現在當我們回顧二十世紀政治潮流的歷史，我們就能够看到我所稱爲「垂死資本主義」正有一個醜惡的、雙面的面貌。在一方面，存在着對技術、科學和專家的能力的一種天真信心去解決一切事情；另一方面，存在着這種非理性主義的基本培養場所、拒斥人文主義、拒斥對人類未來的信念、拒斥對建設性社會變革的信念。這些，我剛說過，是醜惡的一面；因爲明顯地，在某種環境下，這會幫助法西斯主義者或者是具有這些信念的極右傾向的重新出現。

還有其它的因素有利於這個轉變。我們是生活在資本家自己做出來的偉大期望的時刻裏——完全就業的期望、提高生活水平、繼續的經濟生長，繼續的科技進步，都已無情地與急劇地與事變相衝突。人們並不如在六十年代般時期時那般相信事情會繼續變大和變好。甚至乎有一種大的科學進軍。麥道斯報告、羅馬俱樂部報告都說假如事情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就會走向一場災難；原料會重大短缺，整個人類環境會污染——你們必須停止生長。

我並不同意這一點。我認爲「你們必須停止生長」是一個十分落後而反動的想法。你們必須停止無政府式的生長、沒有組織的生長、浪費的生長。你們必須以有計劃

的生長來代替它——生長自身不再是目的，而要從屬於人類的幸福。停止生長就意味着三份之二的人類推向難以相信的災禍生活中去，就好像他們今天仍然經歷着的一樣。假如你有兩部汽車和兩部電視在家裏，說你們必須停止生長這句話是十分輕鬆地。但假如你靠救濟金過活，這就不太妙了。

我們必須明白到未來的所有危險，並且我們必須以我們對人類必能改變他自身的本質、他自身的環境、他能够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底絕不動搖的信念，來反對這些危險。

主要的問題是去改變社會的結構。一天存在着這個瘋狂的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服從於個人致富的競賽，或者是個人競爭——不是幸福的增長、不是真正人類財富和人類關係、愛的增長——而是私有幸福、私有利潤的增長，一天就會有可怕的毀滅力量：經濟的、心理的、軍事毀滅的，以整體毀滅來威脅着我們。知識份子去接受這種事情是不容易的。閉起眼睛、或者信賴一個更高精神來解救我們是更容易一點的。

是的，說人類會被毀滅也是不容易的。因爲這是真理。有可能，而且在不大遠的將來呢。我們的自由會被毀滅，或者是在全球每一地方會有以酷刑爲正常統治方式的政府存在——這是絕對有可能的。這種傾向已經存在。所以逃避主義同時也是拒絕去接受現實。當然，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假如那裏存在着危險，你們就必須鬥爭去反對它們，不只是在它們面前投降，逃進一些個人夢想裏、或者逃進個人逃避裏去。

●作爲長期處於左派周圍的一份子，你怎樣看待一些在某些意義上將自己認同於革命左派的小團體——婦女解放運動呢？

●婦女佔人類過半數，她們是數千年來社會地和經濟地受壓迫受剝削的一半人。這是比資本主義還要長久的，可以追溯到階級社會的最初根源。自然，在這些環境下，在婦女解放運動裏頭，存在着人類自由、解放和社會的革命重新組織底巨大潛力，遠超過性關係的重新組織。

今天我們很難預言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婦女怎樣自由地生活——但有一點我們具有巨大信心去預言的，是它將會完全不同於她們今天在這個社會的生活。它將會是比改變財產權和工廠生產重新組織更加激進。所有由現在開始組織這種解放的嘗試都應該受鼓勵，但不要做成幻想，以爲這基本是個人的問題。這是一種社會的問題，意即婦女運動和工人運動、工人階級的婦女解放之間的橋樑，必須加強。

假如我們成功地將婦女解放運動底巨大的爆炸性潛力結合進社會主義運動去，那麼，我認爲我們將會對建立我們的目標前進一大步。

(本文的訪問和介紹，刊於六月十一—十七號的英國週刊「末落時刻」。本文是節譯原文「西歐資本主義的危機」。)

探訪	願意參加的工作	職業	地址	姓名
聯絡		學校	電話	年齡
投稿		程度		性別
其他				

請參加通訊員行列

凡新思潮讀者均可參加，凡取錄爲通訊員，獲贈閱本刊半年，凡取錄爲通訊員，獲贈閱本刊半年，凡取錄爲通訊員，獲贈閱本刊半年，凡取錄爲通訊員，獲贈閱本刊半年。

以你的興趣和愛好訂定義務工作，填妥表格寄來本社，照報上或信件所刊約見時間辦理登記手續。表格請寄：紅磡庇利街九號八樓。

從就業資料展覽

談青年就業問題

樂仔

每年政府大力宣傳和舉辦的就業資料展覽，都吸引很多同學的參觀和關注。這反映了同學們對自己切實問題的憂慮和徬徨的心緒。各大財團、商業機構在會場內貼上職位等級的薪酬銀碼，技術與機械操作的圖片，印刷精美的小冊子，等等。彷彿這裏就是平等交換薪酬與學歷的市場。從同學們一窩蜂地向諮詢員的熱烈發問，和互相討論或計劃著將來的前途，反映了同學們對茫茫前途，這展覽給予他們的希望，回復樂觀和喜悅。不過，我頓時想起不久之前……

「請坐！」我感到有點奇怪，因為「身份證號碼，姓名，電話，地址，明天返工……」慣是見工時公式談話。為何如此友善？

「你以前會做過甚麼工作？」

「工廠什工……還有當過文員」

「相信你開始在社會工作還不久，這裏是生產塑膠用品的，你的工作是裝配，月薪十八元，工作八小時。」

「有其他津貼嗎？」

「一天動工獎勵。」

噢！待遇太普通，相信很多同學都有類似經驗走了數十間工廠也是同樣低工資，時間長，還有工作刻板苦悶。找工作真煩惱。若去當白領，工資四至六百元，衣著又要考究。如果不是生活壓力迫人，真是懶得去工作。

沉默一刻後，他繼續問：「你能說流利英語嗎？懂打字嗎？因為這工廠接單與出口工作交給商行辦理，將來你可能對公司有很大幫助。同時你在那裏可以學習到產品的生產製造過程，這些工作經驗是相當寶貴的，勝過進修工商管理學，來吧！你不須考慮了，暫時就工作場，將來待寫字樓擴充後，我替你再安排工作吧！」

透過玻璃窗，我望到工作間內，數行工作枱旁的，都是毫無笑容和緊張的，機械化地操作的青年工人，大部份帶近視眼鏡，很明顯，他們是剛從學校跑到社會的青年，也是未來的「工商管理人材，出入口經理」。真卑鄙，因工資低，吸引不到一般勞工，所以用甜言蜜語來騙取初出茅廬的畢業同學的勞力。

這反映了「中學畢業生當藍領，賺取廿元一天」這再不是諷刺了，而是逐漸普遍的現象，由於教育制度不健全使「大學難比登天」，而中學的課程缺乏實用的學科，畢業同學由於白領的飽和而被排擠之餘，只能靠非技術性賤價的勞工，每年畢業人數達八萬之多，有百分之十還是處於失業狀態，無所適從。這數字將來肯定會增長下去。也可能形成更複雜的青年問題。

大機構和政府每年提供的就業職位數目是多少？能佔畢業人數的百分之多少？就業資料展覽沒有公佈。而不能涉足其中的畢業生，不單只受淘汰而且扼殺了他們的發展潛力。政府舉辦「就業資料展覽」，列出社會就業的「廣闊」選擇路途，向上爬的等級和途徑，企圖安撫同學的憂慮，和粉飾這個「繁榮」的社會，但就業困難這普遍存在的事實就證明了它的虛偽。單靠一些指導和說明，對於面臨



台灣政治把的被迫害

十月二十四日國際釋囚協會發表了一份十一頁的聲明，指控台灣政府把數百名的政治犯扣留，並在軍事法庭閉門審判的過程中對這些人進行判決。同時指控台灣政府把政治犯無限期地扣留至審判，還指出台灣政府使用酷刑對待政治犯來迫使犯人招認，並以這些作為審判的證據。HSI-DAR (HSUNG-MIN 陳中銘事件更為使人驚心，陳是台灣的出版人，他在一九六四年時曾因同樣罪名被關入獄五年。陳收集有關對待政治犯的資料和準備出版而第二次被捕，陳被扣留在一台北軍事拘留所被盤問和受酷刑一年後，陳在一次閉門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在國際的抗議後，陳被判十五年監禁，陳曾被單獨囚禁了幾年，並受到許多酷刑和精神的折磨。他曾進行了三次絕食，抗議缺乏適當醫療照顧。

陳是台灣出版人，於一九七一年因出版一本有關台灣自決的書而被捕，他在一九六四年時曾因同樣罪名被關入獄五年。陳因收集有關對待政治犯的資料和準備出版而第二次被捕，陳被扣留在一台北軍事拘留所被盤問和受酷刑一年後，陳在一次閉門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畢業即失業的同學又有何幫助呢！政府是必需向同學們提供全面的就業分配或保障的計劃，但它却推卸了此責任，祇能做些冠冕堂皇的「展覽」而矣。

無論如何，政府希望有大量的技術工人，以迎合資本家的需要。在推行工業中學及文法中學的失敗後，（前者不能升入工業學院或當充技工，後者因缺乏大專學院沒有繼續升學機會成爲無實際目標的教育）。政府便大力推行「學徒訓練」計劃，不論是文法中學或工業中學畢業，須簽約訓練四年，薪金爲四百五十元。四年訓練後成爲技工。這計劃也是配合著中三淘汰制的發展迎合「青年」的出路就扼殺於滿足資本家的需求，成爲社會生產機器的小螺旋釘；而不是培養青年成爲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

爲了給予青年發展他們志趣和理想，政府應發展高等教育和夜間大學，爲了保障夜間大學的學生利益，他們的工作時間應給予縮短。同時工人的最低薪酬必須訂定，以免受低工資，而憂慮生活以致阻礙工餘進修。

同學們的出路和就業是與社會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我們應該開始思考一下考試價值和如何了解社會的問題。

在一個星期內，在美國九個大城市（包括紐約）裏，舉行了一連串的示威，抗議台灣經濟國權迫害台灣，不滿蔣統治的人士。這些示威是由「阻止秘密處決台灣政治犯委員會」(COMMITTEE TO STOP SECRET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AIWAN) 發起的。

這個委員會呼籲重視陳明忠及其他十六人被捕的事件，這些人被蔣政權控告會閱讀中共出版的科技書籍。

這個委員會指出：逮捕、控告和審訊這些政治犯，至今未爲台灣軍事法庭所公佈；它同時指出只有公眾的抗議力量才能迫使蔣政權停止執行對陳明忠秘密宣判的死刑。



台灣留學生在紐約蒙面示威

加拿大全國工人大罷工

我們起來反工資控制鬥爭 (WE'RE OUT TO FIGHT CONTROLS)，在這觸目的號號下，加拿大全國工人投入了這場保衛工人利益的大戰鬥。

超過一百萬工人在十月十四日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紛紛從工廠、商店和辦公室走上街去，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反對杜魯多政府的工資管制法案的大示威，在全國各大城市，工廠工人，商店售貨員，礦場工人，全部一起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頓使全國陷於癱瘓狀態，工廠停止了生產，商店沒有人賣貨，全國工人熱烈的走到大街去齊集一處，爲他們的共同利益團結一致地，採取了一齊的步伐，向杜魯多的工資管制法案進軍。

在這次反杜魯多的工資管制法案的鬥爭中，出現了英語加拿大工人和魁北克工人大團結顯現，十月十四日便有二十三萬魁北克工人參與罷工行列，這是魁北克省歷次鬥爭中參與最多人數的一次。同時在十月十四日這次鬥爭中，更顯示了加拿大工人的獨立戰鬥的能力和意識的提高，逐步擺脫了工會官僚的控制，在這次大罷工前，工會領袖曾試圖阻擾這次事件，在許多地區的工會裏，許多工人不願工會領袖的勸告，投入這次戰鬥。

波蘭政府對工人的迫害

在波蘭工人英勇和迅速的動員反對波蘭政府提高物價政策，迫使波蘭政府撤消提高物價的政策後，政府便開始進行迫害活躍的工人份子，並且有許多人被捕下獄，雖然波蘭政府說有五十三人被捕，據估計，最少有一百人被捕，有些更被判決十年的刑期，在這次迫害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則尚未知道的。

最近，一個支持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件後被迫害工人委員會在波蘭成立起來，雖然政府對委員會的成員同樣大舉迫害，但他們仍堅決地與被迫害工人團結一起，並在面對失掉他們自己的工作危險，向政府提出要求：

(一)立即釋放六、二五事件後被捕的人。

(二)恢復他們的工作，不得削減工資和工作職位。

(三)停止所有政府官員偏見和警察暴力對付表示與被捕者團結的知識份子。

各版徵稿

來稿請以原稿紙書寫，勿一紙兩面
●文章一經刊載，贈閱新思潮三期
●需退稿者請註明

波蘭政府對工人的迫害

在波蘭工人英勇和迅速的動員反對波蘭政府提高物價政策，迫使波蘭政府撤消提高物價的政策後，政府便開始進行迫害活躍的工人份子，並且有許多人被捕下獄，雖然波蘭政府說有五十三人被捕，據估計，最少有一百人被捕，有些更被判決十年的刑期，在這次迫害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則尚未知道的。

最近，一個支持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件後被迫害工人委員會在波蘭成立起來，雖然政府對委員會的成員同樣大舉迫害，但他們仍堅決地與被迫害工人團結一起，並在面對失掉他們自己的工作危險，向政府提出要求：

(一)立即釋放六、二五事件後被捕的人。

(二)恢復他們的工作，不得削減工資和工作職位。

(三)停止所有政府官員偏見和警察暴力對付表示與被捕者團結的知識份子。

上接第六版「中國革命與婦女解放」

給予婦女特別提升的機會，使她們能參與高級的政治、行政和政府機構的權利。各級政府、軍事和社會機構，都要給婦女打開大門，並且給她們特別提升的權利。給男女同等的投票權和被選權。

●給婦女完全的經濟獨立：不論在農村或城市裏面，實施男女同工同酬。給婦女同等就業的機會，停止國家代替或強迫婦女選擇職業。停止任何產後部門和軍政對婦女參與的限制。給農村婦女全薪產假。保障婦女使用自己工資和財物的權利。

●建立足夠的全日托兒所、幼稚園、學校、洗衣工場和公共食堂和宿舍，免費供給每一個家庭和獨居的婦女（不論已婚、未婚或已離婚的），使她們擺脫家庭奴隸的地位。

●給予婦女完全控制她們生育機能的權利：即是婦女享有單方面決定是否終止懷孕的權利，亦意味著停止目前「控制人口」名義下的半強迫性節育。停止政府對墮胎和避孕作任何限制。完全免費的墮胎權利。免費提供避孕器具。完全開放的性教育課程和知識。

●給婦女和青年完全的婚姻和性愛的自由。國家和教會不得干涉任何的婚姻和性愛關係。男女的自由交往、戀愛而不得受排斥、歧視或干涉。男女任何一方提出離婚就得到合法的權利。（國家給與離婚婦女合理的福利和就業機會）

●給離婚後的子女以國家照顧。給同性戀者完全合法的權利。阻止任何對未婚母親和其子女的任何歧視，給予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利。

●照顧和教育子女的職能由社會承擔，終結任何父母限制子女自由權的法律。

●給婦女與男性完全平等（包括進入高等學校）的教育。

育權利。反對任何將婦女當成次要性別的任何書本、課程和理論。設立特別課程研究和教授婦女受壓迫的真實歷史。結束所有假稱的「婦女課程」（例如家政、文書、會計、護士等）。特別的體育課程鍛鍊婦女的體格。停止開除任何懷孕的學生和未婚母親。

所有這些符合婦女底真實利益的要求，都與官僚階級的利益相衝突。中國婦女無需要考慮官僚們的利益和政策，更不可能將半數人口的利益和需要從屬於官僚之下。她們所需要的，是爭取自己的獨立要求和權利。對於她們的行動，所有認真地支持社會主義的人，都應該堅定地支持。只有中國現存官僚階級的消滅，中國婦女才能走上真正的婦女解放的道路。

（全文完）

第五章註釋

- 註一：RUTH, P. 22。"中國婦女新生活"，一三頁。
- 註二：帕蒂·陶海，「中國婦女新生活」，一三頁。
- 註三：思中著「談談國內專上教育情況和教育革命」，原載於浸會學生，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
- 註四：密芝根大學出版社「WOMEN IN CHINA」，一〇二頁。
- 註五：LINDA GORDON, 「THE FOURTH MOUNTAIN - WOMEN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FOR A NEW SOCIETY」, FALL, 1973.

第六章註釋

註一：宋慶齡「婦女的解放」，英文譯文刊於密芝根大學出版WOMEN IN CHINA。

註二：紐約時報，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

註三：HSU KUANG, WOMEN'S LIBERATION -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中國重建」，英文版，七五年六月。

訂閱

全年六元正 (連郵費)

堅持鬥爭就是勝利的保證

小兵

在本年六月五日，石鼓道的居民及廠戶被「港英」當局通知，將要收回該區，並限令居民於十一月前遷出，政府對居民是作一些極其微小的補償，而對商戶和廠戶均無任何安置。

面對著政府橫蠻無理的逼遷，居民唯有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合理權益，他們的代表多次到工務局，民政司和房屋署進行交涉，並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政府當局視若無睹，反而加緊派人往各大廈量地，大有「你們能奈何老子嗎」之概。

港英漠視居民要求的態度，使居民更清楚認識到政府的無理岸岸，他們要用行動去回敬這些挑戰。首先是「巨幅標語」上街，跟著是「記者招待會」，在不同的程度上將自己的要求及政府的無理逼遷一一訴諸於眾，並於七月廿六日動員百餘人前往房屋署請願，政府面對這一連串行動所產生的壓力，不得不作出些微的讓步。但這些微的讓步，並不能滿足居民的要求。新的行動又再展開，居民已經從現實中得到經驗：祇有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才可以使要求變成事實。

其後，在十月廿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並邀請兩位議員出席，但得到的祇是一紙「延遲遷拆」的公函。而政府雖一度答允對廠戶居民作適當安置，並在「傳播媒介」上透露，但在二日後，即加以否認。「出爾反爾」的手段令石鼓道廣大居民深感憤慨，並將這憤怒付諸於行動，十一月八日，居民代表手持巨幅中英文橫額，逕赴布政司署要求當面商討安置問題，並且聲言不獲安置，「誓要鬥爭」，港英面對石鼓道全體居民、廠商戶堅強而英勇的鬥爭，每一次的行動均比前激烈，不得不在十一月月中旬作出安置的承諾。

從石鼓道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港英態度的轉變，不是甚麼「體恤民意」的德政，它是在一場「鏖而不捨」的鬥爭中敗下陣來，一九七三年成立的新法例，不是說「被遷拆的商戶均不再獲得安置」嗎？一九七六年為甚麼會有安置呢，這充分反映了港英的虛弱，面對著群眾鬥爭的浪潮，虛弱的堤壩——法例就要崩潰，倒下。無理論擺出傲慢或者慈悲的態度，本質上它就是壓迫民眾，懷改、分化、高壓。法例的權威祇是手段的轉變而已！

石鼓道的鬥爭是初步勝利了，但是勝利的獲取，是靠居民的團結鬥爭，上下一心，堅持鬥爭。決不是甚麼兩局議員「體恤民意」的結果，從以前泰安大廈，和葵涌的逼遷事件中的鬥爭失敗，到今天石鼓道的勝利，充分地表明一個道理：面對港英無理的逼遷，我們祇有自己動員起來，進行不懈的鬥爭，而不是祈望「社會賢達」「父母之官」的施予，一句「堅持鬥爭是勝利的保證」。



Blues 怨曲

PHILIP

怨曲 (BLUES) 是爵士樂的主要傳統，美國音樂的一大根源。到了現在，怨曲流傳到每一角落；不過離開了本土及發源地，怨曲一直被冷落着。早在二十年代，怨曲已開始傳遍，流浪的街頭怨曲歌唱者到處賣唱；從城市到城市，也有從鄉間或棉田到大城市的「土佬」怨曲歌唱者，他們唱出了有血有肉的經歷。怨曲只在黑人聚居的地方流行，也成為黑人的「專利品」。投機份子便抓着機會，把當時有份量的藝術家收買下來，灌錄了怨曲的唱片，而售賣市場也十分可觀。基於種族問題，當時的唱片銷路只限於黑人；白人有喜歡怨曲的也要候至深夜才可以偷偷摸摸的放在留聲機上播出。

怨曲從何時開始，可能永遠得不到答案；研究越久就會發現怨曲的歷史越深。怨曲已存在民間，是美國黑人民間音樂的結晶品，不過怨曲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為人注意；怨曲的產生可能是很偶然的——一些黑人在工作或是休息時所唱的歌流傳下來，就是後來的怨曲。

要了解怨曲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真正了解它非要把自己放進怨曲裏不可；怨曲是黑奴喪掉生命，受盡痛苦虐待的親身體驗換回來的藝術結晶。所以怨曲的價值是不可衡量的，也是黑人文化最重要及最寶貴的部份。

為甚麼會有黑奴？為甚麼黑奴要受非人的對待？要詳盡的解釋，可以寫一本很厚的書。不過簡單的說一兩句話也可以有個答案——基於人的本性「自私自利」。讓我們看一點跟黑奴有關的文字吧，有感情的人都會起反應。

販賣黑人是白人的「大買賣」。賣主（也就是把黑人當畜牲一樣買回來的白人）在一次買賣裏可以賺到廿倍到卅倍的利潤，舉例說一塊錢買一個黑奴回來可以用廿塊到卅塊錢的價錢賣出去。所以販賣黑奴的白人用盡方法壓迫黑奴，用軟硬並施的方法大批的販賣黑奴到美洲及歐洲各國去。美國在一八〇七年及一八二〇年在法律上通過買賣黑奴是不合法。不過在整個世紀多過後，紐約有一種快船

可以在一個星期內運一批黑奴。大概在一八三九年，一條叫《VENUS》的船載有八百六十個黑奴在古巴下貨，而其中的二百四十個黑奴在途中經已死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每一次「貨運」中，都有大批的黑奴在途中死掉。大不列顛帝國（最早發現販奴的「財路」）表現出帝國的氣概，讓人有絕對的自主及自由，而黑奴也算在內。他們問黑奴們願意做七年的《APPRENTICES》（中文譯作學徒或後生）與否，回答就一定是YES（願意）——黑奴們根本沒有機會回答NO（不願意）；而事實上他們用一些黑奴聽不懂的說話發問黑奴。當然別的小國也有更不合理的對待。

我們直覺上會覺得被販賣的黑奴必定是成人而強碩的，不錯這是買奴者的對象，不過我們想也想不到的却是實在在在的事實；小黑奴平均只有七歲的也給一批批賣到異地。黑奴有給白人用暴力抓着的。他們的酋長（部落的領袖）也很樂意把同胞賣到白人手裏。白人給酋長們很大的利益；以後酋長們可以拿槍去殺人，喝威士忌作樂。而將要被賣到異地的黑奴就更悲慘，麻繩跟鐵鍊永遠離不開黑奴們；「脖子上流血，眼睛裏流淚」。困在船裏的就更不好受，擠在一塊兒，而各樣的疾病也就滋長起來——赤痢症、黃熱病、皮膚病、生寄生蟲、眼疾，最可怕的是渾身上下長滿了天花。而有些女黑奴在船中產下嬰孩。

運到岸上的黑人就被賣掉（用叫價的方法）；女的黑奴叫《BREEDERS》（女的是要來生蛋），現代的婦解份子聽到可氣死，打一兩個耳光也出不了氣。這些畜牲（路易士安那州的民法是這樣稱呼黑奴的）不能做甚麼，也做不了甚麼，也不能夠擁有甚麼——只有一樣是實在的，黑奴是「屬於」他們的「主人」。後來黑奴得到解放，不過黑人的生活也越見艱苦。黑人受到隔離、歧視，所以很多怨曲歌唱者都跟黑社會勾上，而且有些是罪犯，殺人犯者。鉛肚皮（LEADBELLY）是著名的黑人怨曲歌唱者，他曾殺過人，幾次被送進監獄。路易士安那州（LOUIS ARMSTRONG）在少年時也被冤枉送進類似童犯中心的地方。

黑奴生活在痛苦裏，他們受着逼迫；心理及肉體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及折磨，歌唱便是他們的發洩工具。他們唱出內心的憂鬱、憤恨、孤寂，唱出了期待、希望，唱出了生活的艱苦，生活的敗壞。牢獄滋味、人性探討、對政治制度的反抗，這都是怨曲所表現的。現在的怨曲在曲體及歌詞都有所改變，除了原有的憂鬱及控訴，更直接的道出了城市生活的沉悶，愛情的失落及被社會拋棄等等。爵士樂的家族中，怨曲是一大支派，怨曲的歷史比爵士樂還要早。在唱怨曲中有所謂「三行格」的句法，就拿以下的歌詞為例：

MY WOMAN TOLD ME, SHE DON'T LOVE ME ANY MORE,
MY WOMAN TOLD ME, SHE DON'T LOVE ME ANY MORE,
HIT THE ROAD BABE, AND NEVER COMING BACK AGAIN.

歌者唱第一句的時候說出一個事實或是表達其內心的情緒；她用一句子重複的唱一次作為強調及加重語氣，這是第二句；而第三句則是反應或是發展。而這種「三行格」則是怨曲的古老曲體，亦即是十二小節（TWELVE BAR）怨曲，因為十二個小節是要來配合「三行格」的。把十二小節分成三段，每段四小節，每段都配上不同的和弦。在歌唱的時候，每句所花的時間是每一段的一半或多一點，而在歌唱者唱完每句之後還有若干時間給樂器作響應，這叫做「呼喚和響應」，是怨曲跟爵士樂最常見的形式。而「吶叫」也是怨曲的主要特質之一，吶叫是半唱半喊的形式。現在的怨曲曲體脫離了舊有的形式，歌唱部份也比較旋律化，當然還有加上了新的特質。

怨曲之所以流傳，歌唱怨曲的藝術家是功不可沒的。他們的歌，他們的生涯，就是怨曲。HUDDIE LEDBETTER 別名叫 LEADBELLY（鉛肚皮）是對傳統怨曲最有影響力的歌唱者，「他就是傳統怨曲」。他最初因爭女朋友而殺死友人被判入獄。其後得到特赦，不過接着又數度入獄。而早期的怨曲歌唱者大部份都跟罪惡拉上關係，所以牢獄生涯也是怨曲所要表達的一部份。

最早期的怨曲是沒有伴奏部份，以歌唱為主體。「靈歌」跟「作活歌」便是早期的歌唱怨曲。伴奏樂器以鋼琴及結他為主。因為黑人都是賤民階級，鋼琴跟結他是他們負擔不起。不過一些怨曲歌唱者會想盡辦法弄一支結他。而在大城市居住的音樂家有機會接觸到鋼琴，而這些音樂家奏出的鋼琴音樂有他們自己的風格；而後來一種重要的音樂形式叫「暴極嘩極」（BOOGIE WOOGIE）就是怨曲的原本。不過他們大部份都不懂樂理，而他們不懂得彈奏別的音樂。LOUIS ARMSTRONG——最著名的爵士樂喇叭手，他也是不懂樂理的。五十年代的「搖擺樂」（ROCK）六十年代的「節奏與怨曲」（RHYTHM AND BLUES）及「搖滾樂」（ROCK 'N ROLL）都是脫胎自怨曲。更有許多音樂家嘗試把怨曲跟別的音樂混合在一起。五十年代是白人樂隊開始仿效及演奏怨曲的時代，而搖滾音樂是五十年代後期才開始發展的。不過要在六十年代初期過後，白人的音樂家才成功地奏出異於黑人的白人怨曲。黑人的嗓子多比較沙啞、粗獷，而且黑人身受種族隔離及各種不平等待遇，所以黑人的怨曲是黑人的專利品。不過白人的怨曲也有怨曲的味道——吶叫、狂野、悲哀。

我喜歡聽怨曲，為甚麼？因為大部份的怨曲歌唱者都是經歷過人生的風浪，奮鬥過及掙扎過，對生活有實在的體驗，決不是無病呻吟。很多怨曲歌唱者都是在街頭、咖啡室及小酒吧賣唱，從城市流浪到另一城市，受着生活的壓迫；你敢說歌唱者唱出的怨曲是病態的、荒謬的嗎？怨曲歌唱者所唱的充滿了感情、心緒；是有血有肉的歌曲。憂怨的音符加上活生生的簡單得迷人的曲詞，聽起來是那麼令人神往，不禁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怨曲給黑人帶來慰藉，更灌醉現代人麻木的心靈。怨曲更幫助我們了解生命，在我們耳旁細訴着「人生是痛苦的包袱，我們要把它背上」。而怨曲更修把尖刀，戳破了我們生活的痛苦、虛空、失落及荒謬；揭開了文明虛偽矯飾的。

